

德育小丛书

理想与改革

潘建雄 诸争鸣

LIXIANG YU GAIGE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德育小丛书

理想与改革

潘建雄 诸争鸣 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中外古今历史的辩证发展来探讨改革与时代的关系，改革与实现社会理想、个人理想的关系；并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紧密联系我国改革的现实，展现了我国改革家的崭新风貌，揭示了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趋势。

全书寓历史知识与哲理思辨于一炉，史料丰富，论证有力，是一本值得向大、中学政工干部、教师及广大青年推荐的思想理论读物。

德育小书丛

理 想 与 改 革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淮海中路1984弄1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交通大学印刷厂印装

开本：87×1092毫米 1/32 印张2.875 字数64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T-313-00195-9/D648 沪号：140—119

定价：0.75元

前 言

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培养青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精神，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青少年进行理想、人生、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我们组织编写了《德育小丛书》，作为大、中学生自学读物，也可作为大学、中学教师，政工干部和企业、机关、部队的政工干部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参考用书。

本丛书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伦理学、心理学等有关学科的知识，针对当代青年在人生、理想、道德等方面带有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阐述。丛书还运用中外古今名人、学者、革命先辈、先进人物的事例，启发、引导、说理，使青年能自觉确立革命的人生观，革命的理想，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本册《理想与改革》从历史的进步说明改革与时代的关系，主要结合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与当前我国改革的实际，结合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进一步分析我国改革家的风貌和改革深化的发展趋势。

本书在编写提纲和初稿讨论中，曾得到上海交大、江西师大、扬州工学院、浙江师大等校党政领导同志的积极支持和指导，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对本书的组织编写给予不少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丛书主编：施福升、朱宁康、刘绍龙。

本册编写人：潘建雄、诸争鸣

67A72137

由于编写者水平所限，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德育小丛书》编写组

1987年12月

目 录

一、是谁在呼唤改革？	(1)
1. 改革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	(1)
2. 改革是时代挑战的 回响	(4)
3. 改革的艰难与曲折	(9)
二、改革与理想	(14)
1. 理想：人类改革的目标与动力	(14)
2. 事业与献身	(19)
三、在成功与失败之间	(26)
1. 成功？ 失败？	(26)
2. 历史与现实	(28)
3. 个人与社会	(32)
四、社会主义理想与改革	(40)
1. 社会主义——几代人的理想	(40)
2. 从空想到现实	(45)
3. 发展与改革	(51)
五、我们身旁的改革家们	(56)
1. 充满改革气息的时代	(56)
2. 平凡而又高大的群像	(58)
3. 一代风流与社会主义理想	(67)
六、你是改革家吗？	(72)
1. 勇气和首创精神	(72)

2. 审时度势的才能..... (77)
3. 不屈不挠的意志..... (81)

一、是谁在呼唤改革？

1. 改革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

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化之中。大约在50亿年以前，我们今天所生存的星球，还只不过是一团混沌的星云，在那浩渺的宇宙空间中缓缓地旋转。随着时光的流逝，大自然展现了它的神奇的法力，于是，有了地球，有了山脉、海洋，有了最初的生命，乃至最终产生了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多少年来，我们的祖先们震慑于大自然的这种神奇力量，匍匐在它的面前，把一切归之于万能的神灵。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有一位叫盘古的神灵，他用一把巨斧把混沌世界一劈为二，于是有了天地之分，而在这天地之间产生了我们人类。人们把他看作是自己的祖先。而在西方基督教的故事里，地球是由上帝创造的，他还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第一个男人，又抽出此男人的肋骨捏出了第一个女人，这就是亚当和夏娃，欧洲人的先祖。

所有这些人类早期的充满浪漫色彩的传说和信念离我们现在已经相当遥远了。今天，除了诗人和艺术家们还偶尔回到这些古老的神话中寻找灵感之外，在实际生活中它已经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宇宙之谜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谜，但是有一点已经人所皆知，那就是，在整个宇宙自然之外，并没有超自然的神力。没有神的奇迹，自然界自身就是奇迹，它

处在永恒的运动和变化之中，是运动与变化创造了一切，一切事物都在按照自然本身的法则，从低级走向高级，一句话，在进化。正如伟大诗人歌德所咏叹的那样，“世界是永恒的一个，却又显示为许多，小变大，大变小，万物各按其本性。近移远，远移近，坚持不渝，变动不停，这样在创造，这样在革新”。

那么，人类自身又怎样呢？是否也象其他宇宙万物一样，可以用进化来解释和说明自己的历史呢？是的，人类有过自己的进化史。我们的祖先是从小猿类进化而来的，正如达尔文所发现的那样。但是人类一旦开始把自己从自然界分离出来，便开始创造了一部不同于自然的文明史。在这样一部文明史中，进化的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一切了。诚然，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整个宇宙史一样，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不断地从低级走向高级，但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在另一方面却是同自然界相对立的。作为一种理性的、有智慧、有思维能力的最高级的生命，并不简单地顺应自然，相反地，要积极地摆脱自然束缚，竭力去控制自然，改革自然。人把整个外部世界当作客体，而让自己成为历史的主体，这种有目的的自主性，正是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

因此，如果说，自然界的历史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人类社会的历史则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人类不仅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先进的物质文明，而且也不断地塑造着自身。人类正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形象，创造着新的社会组织 and 群体组织。比起3000年以前，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形式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更不用说同5000年前列祖列宗相比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改革，其实正是人

类社会的一种最基本功能，是社会生存和文化进步的永恒需要。它是一项既古老又永远年轻的事业。如果说，现今，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任何一种文化都已经同它初创时期的形态面目全非的话，那么这种变化绝不是凭借着一种自然进化的动力，而恰恰在于人类的不断创新，不断变革，使它日益丰满而成熟起来，它是一种人类的自觉进步。没有变革，没有创造，没有除旧布新，人类社会就永远不可能进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都曾经出现过一些能够洞察历史潮流，具有远见卓识，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者。在中国，有象商鞅、王安石、康有为、孙中山这些杰出的人物；在欧洲，同样也有拿破仑、彼得一世等见载于史册的名人。他们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本身不过是人类社会永恒进步的客观要求的反映。不管历史上人们如何称呼这些变革的举动，“变法”也罢，“新政”也罢，“改制”也罢，“维新”也罢，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突破已经落伍的陈规陋习的束缚，用一种大胆的变革精神倡导或实行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制度结构、伦理观念，以此来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他们至今依然在人们中间享有某种声誉，完全是受之无愧的。

正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不能依赖自然进化规律的支配，历史才会变得如此丰富多彩。变则进，不变则退，在漫漫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的文化进步了，有的文化则停滞了，有的由先进变为落后，有的则从落后跃为先进，甚至有的已经完全灭绝，只留下一些文物古迹，以资后人凭吊兴叹。正所谓，各领风骚数百年。一个民族的活力，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它那种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变革能力之中。只有这样，它才能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社会文化财富，推动历史的发

展。

2. 改革是时代挑战的回响

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这样描述过古代埃及文明的起源：在文明的黎明时期以前，亚非草原（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一带）本来是一片水草丰盛的地方。这一片草原在长期而不断加剧的干旱过程中，就对那里的居民提出了一种挑战，那里的人们面对着这种挑战不得不作出反应。有些人没有改变居留地，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就出现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另一些人改变了居留地，而不愿改变生活方式，他们向南方迁移，这样就保留了他们原始的生活方式——他们到今天还是这样。而还有一些人既改变了居留地，也改变了生活方式。他们走进了尼罗河三角洲的丛林和沼泽地区，面对挑战，他们动手搞排水工程，结果创造了古代埃及文明。

我们不知道在这一段描述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只是想象，但是，它说出了一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任何一种民族的变革行为，都是一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是面对一种挑战的响应。当然这种挑战并不只是出现在外部环境中，同样它也常常出现在社会内部，以及各个社会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在历史上所出现的那些重要的改革人物，不管其本身形象多么高大，都只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环境塑造的结果。改革，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一些杰出人物的即兴之举，正如一位当代法国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人们有了什么新的想法，所以才进行变革，而是因为历史环境迫使人们不得不改革，所以才会使人们产生改革的动机。我们可以从世界近代历史上，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中，三次最著名的社会改革

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三次改革分别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19世纪中叶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19世纪末中国的“戊戌变法”。

17世纪中期，乌克兰被并入俄国以后，俄国成为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但在经济上，这一庞然大物却远比西欧国家落后。这时期，英国已经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新型的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造船、制铁、酿酒、玻璃制造等等都有了发展。同时随着15世纪末出现的航海业的发展，地中海一带的沿海国家也纷纷通过新航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那个时候的俄国还没有通向西欧的海口，完全是一个内陆的国家，国内还实行着早在14、15世纪就已在英法被解体的农奴制度，农业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生产工具主要是木犁或木耙。

经济上的落后，不仅使得它在国内矛盾重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同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面对当时邻近军事强国瑞典，俄国屡战屡败，被迫割地求和，以求得生存。年轻的彼得一世正是在这样一种处境中开始了他作为帝王的政治生涯。为了改变俄国的这种落后处境，他从1689年镇压了部分宫廷贵族的反叛，取得了实权之后，便开始倡导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在他著名的长篇传记小说《彼得一世》中，曾描写过这样一段情节，有一次彼得召见部分商人，在介绍了一些西欧的情况之后，十分严肃地说：“到外国去看看人家的商人们——他们简直是皇帝！我们没有时间等你们自己教会自己了。”我们非强迫把猪鼻子塞进槽里去不可。为什么外国人总不让我安定呢？他们要我租给他们这个，租给他们那个——木料、矿石、制造品。为什么我们自己人不能这般做呢？有一个人到佛罗内兹来——魔鬼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且听他发出来的议论，提出来的计划！你们这般人，他说，有着一个黄金的国家，只可惜你们的人都是穷的。这是什么缘故？他问。我一声都不响。现在我来问你们：是不是在我们国家里没有这种人？”。

通过这番激奋的言辞，这位年轻君主面对外来压力所产生的沉痛之感跃然纸上。正是这种压力而产生的使命感，使他排除阻力，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他首先改造旧式军队，实行征兵制，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现今依然十分重要的乌拉尔和土拉的工业都是在这时期开始建立的。先后设立了纺织、制革、造纸等工场 200 余所，为以后的俄国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彼得推行了许多政治改革措施，废除贵族杜马，整顿十分混乱的税务机关，建立参政院，分州为省。此外他还建立新都彼得堡，创办科学院、医学校、海军和炮兵学校。在文化上，简化俄文字母，采用新的历法，奖励翻译西欧著作等。

这场巨大的改革运动一扫陈腐旧习，使俄国逐步摆脱了极端落后的状况，逐步开始向现代社会过渡，在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个在困境急剧思变的典型例子就是发生在我们东方的近邻——日本。

世界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日渐东下，对东方各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19 世纪以前的日本同中国一样，也一直处在闭关自守、与世无争的境界中。自从 1636 年颁布“锁国令”以后，日本断绝了同世界各国的来往。除荷兰船和中国船之外，一律禁止来访，即使是这两个国家的船只，也要在贸易港口和居住地区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在长达 200 年间，除

了漂流国外的渔民之外，日本人谁也没有去过国外。这种停滞、平静和孤立的状态终于在1853年被美国军舰打开了。屈辱的、被迫的开国以及接踵而至的民族危机，使日本人深切地感受到由于经济和军事上的落后所带来的威胁。

开港以后，日本对外贸易激增，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由于黄金大量流出，钱价下跌，促使米麦、盐等涨价。1859~1867年的9年中，三都物价上涨了2.5倍以至7倍，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生活的困难。外国棉布充斥国内市场，使国内丝织手工工场和手工业者遭到严重打击，市民和农民的暴力斗争此起彼伏。

同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乘日本政局混乱之际进行武装干涉，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863年，英法两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在横滨驻兵。同年7月，英国又假借生麦事件，派遣舰队袭击鹿儿岛，索取巨额赔款。继尔又强迫幕府出资在横滨为英军修筑兵营。1864年8月，英、法、美、荷组成联合舰队攻击下关，占领下关炮台，向幕府勒索300万美元赔偿费。

所有这些，构成了日本民族生存的巨大危机，这些危机唤醒了日本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使他们深切地感到，日本社会不经过一些剧烈的变革就将在列强瓜分下灭亡。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就这样开始了。这场变革使得日本迅速地摆脱了危机，一跃而变为军事强国，为日本以后的道路打下了基础。正如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说的那样“这样，明治时代人们的惊人努力，借助德川时代的遗产，以及生逢其时的幸运，使得日本的近代化获得了成功。”（参见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

从以上两个国家的变革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在危机中奋起，从而获得成功的例子。强大的内外压力形成了对民族生

存的强有力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人们被激发起强烈的变革动机。传统的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政治管理方式成了发展中的阻碍因素，改则进，不改则退，改则生，不改则亡。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只是一种针对时代的挑战而发出的回响。它深刻影响着—个民族自身发展的道路。它的全部根源和主要动因根植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中，并不是任何大天才的倡导。

近代史上第三次巨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那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尽管这场变革运动最终遭到失败，上演了一幕历史悲剧，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前两次社会改革更具有历史性，给人留下的启示更深刻。但是在其发生的历史背景上，它同前两次改革运动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只是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更弱，矛盾更复杂，危机更深刻。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便开始不断地侵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面临着一种生死存亡的考验。一大批中国的有识之士被这种危机所唤醒，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赔款割地，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整个民族都被激发起来了。当时维新的首要人物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尖锐地指出“筹国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革，在当时无疑成了一场民族自救运动，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维新志士，整个变法运动就是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和推动下兴起的。

从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场历史性的挑战会促成整个民族作出强有力的反映，在整个社会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愿望。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有时候危机尽管以外部矛盾的形式

式表现出来，但是要摆脱危机则只能从强健自身开始，而只有改革变法，除旧振新才是强健自身的必经之路，除此之外，人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一点深刻反映了改革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3. 改革的艰难与曲折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创业难，守业更难。”为什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守业更难？其原因就在于创业是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的，它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来的图像和色彩，而守业则不同，它是在已经奠定前提条件下，要根据变动的历史环境而不断作出新的调整，它要受到传统所遗留下来的惰性力的阻挠。它也需要不断的创造，正如当年有人对刘邦所说的那样，在马背上得来的江山，不能在马背上去巩固它，因为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也要不断地变革。它是一种更为艰苦的创造，因为它所面临的已经不再是一张白纸，原有的图像和色彩可能束缚他的想象，产生某种习惯势力和行为偏向，使他的再创造过程变得更为复杂。这正是一切社会变革都会面临的困境，它使得改革过程艰难倍出，有时甚至半途夭折。

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在我国历史上北宋年间所发生的一场改革是如何几经反复，大起大落的。

范仲淹，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著名的人物，他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流芳万古，至今仍常常被人吟诵。他出身北宋年间，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当时，由于内乱外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处在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由于大量的土地兼并，农民倾家荡产，流

离失所。同时由于连年征战，赋税日益加重，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到了庆历二、三年间，范仲淹官封参政知事。面对当时深重的社会危机，他联合韩琦、欧阳修等人开始实行大规模改革，希望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致太平”，出现了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时期。

范仲淹等人雄心勃勃，从整顿吏治，改变官僚的冗赘、无能与腐败着手，试图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实行新政，从而改变国家既贫且弱的局面。1043年，他提出“十事”，也就是十条改革措施，其内容包括均公田、减徭役、精贡举等等，期望在全国推广。但是这些法令和主张明显地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在陆续施行的过程中，随时都遭到他们的阻挠。反对者们勾结起来，诽谤愈来愈盛，把这些激进的改革家们说成是结为朋党，败坏朝纲，最终触怒了皇帝，1045年，范仲淹被罢去参政，逐出中央政府。韩琦、欧阳修等人也被赶出京都。

“庆历新政”推行不及一年便被明令废止，改革事业刚刚萌芽便夭折了。徒怀壮志的范仲淹只能以诗文赋志，郁郁不已。

尽管“庆历新政”失败了，但是国内的矛盾和危机依然存在，隔了14年之后，当年同范仲淹一起变法的韩琦重又为相，这时候，中国历史上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王安石开始露出了他的政治头角。他上万言书给皇帝，痛陈财力日乏，风俗日败，要求对现行法大加改革。从时间和内容上看，他的改革主张实际上是“庆历新政”的再续，是经过一段低落之后，重又高涨起来的改革潮流。

被列宁誉为“11世纪中国真正的改革家”的王安石，1021年出身于抚州一户寒素的地主家庭。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年轻时就颇负盛名，怀改革时弊安国振邦大志。1058年，